

新世纪
乡土小说的
生态批评

XINSHIJI XIANGTU
XIAOSHUO DE SHENGTAI PIPING

黄轶◎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新世纪
乡土小说的
生态批评



XINSHIJI XIANGTU
XIAOSHUO DE SHENGTAI PIPING

黄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批评/黄轶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8

ISBN 978-7-5473-0980-3

I. ①新… II. ①黄…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9129 号

策划/责编 鲁培康

封面设计 久品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批评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80-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本书由苏州大学优势学科资助出版

代序 内省的力量

最近,笔者重读《楚辞》和张炜的《楚辞笔记》。或许,只有拥有绚丽文采和敏感笔触的人,才有可能追踪屈原那一篇篇千古绝唱吧。当然,这个以粗鄙为时尚、排拒优雅和深刻的时代,注定了今人遥望遍开鲜花的汨罗两岸时的心灵悲剧。春秋战国,那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大时代,但那终究也是大分崩大离析的时代,多少仓皇凄凉的灵魂故事一一排演。在《楚辞笔记》中,屈原并不仅仅是不被信任的臣僚、遭遇放逐的贵族,也并非史书上一再渲染的爱国志士——他更多的是一个奉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行吟骚客。正是流浪与行吟,才有机会塑造了他的沉思和内省,才有了绚烂华彩背后那份抗拒流俗的苍凉悲壮,那份抵御流言的高迈傲骨,那份对感情的沉醉、依恋与哀伤,那份对民生多艰的长长太息汤汤泪流,那份对末世之哀的无奈和疼惜……这是今人面对时代大转型、竭力维护自我精神域地的纯洁和纯粹时,所不得不引为共鸣的。

难道,这就是我们与屈子千古遥契的缘分?阅读《楚辞》时千转百回的愁肠只是为了遥应那个至美灵魂孤独的生命体验吗?不!在一个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幕落花凋的娱乐时代,当“七夕”变成了一夜娱情,“中秋”被置换成奢华的月饼,待“端午”也变成了粽子的时尚言说,你说这是屈原的悲哀还是今人的悲哀?从革命的异化再到物质的异化,我们遭逢异化的命运为什么不能改观?即便“多元”并

存“一体”显示了知识者人文精神的高度,在网络传媒、影视文化的洪水冲刷出的“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伦理预谋?我们陷入了“无物之阵”,在虚华仓皇错乱。或许正如闻一多在“敬质”孙次舟时所分析的,屈原的悲哀正在于他本该做好一个“弄臣”,但他忍不住要做一个“文人”而参与到“公共思想领域”吧。那个拥有可贵的内省力量的诗人,“不为邀宠,不计贫贱,从而赋予‘忠’特殊而固定的内容”,也抗拒着知识者的心灵蒙难。所以,对屈子的眷念应该包含对历史和现实荒诞的质疑,尤其是那种对任性自由、桀骜不驯、柔韧旷达的精神的崇拜。这是文人的永恒心结。

文学经典是穿越历史隧道能与后人心灵共震的艺术,《楚辞》悲伤的文字已漫过千古,我们只有鼓起勇气才能面对那份由沉思与内省玉成的高贵与尊严。但是,当我们“融入一片时光”、让“时代的一切阻障都在这个时刻里消融”而力显自己的高标独异时,是否也预示着知识者在挽救不了精神滑落时就只有一条去路了:做个香草美人!这自然是一种轻松自在的选择,但遭忧的心魂怎么可能在沉湎于怀旧、轻绝于时代中安然?当下,我们正以退守的姿态、怀旧的快感和审美的激越惊羨、惶惑又悲壮地拥抱传统——传统何罪?关键是传承什么、怎么传承!对传统文化的叩问和回溯会变成另一场闹剧吗?

如果文学写不出大变局时代的崇高与堕落、理性与疯狂,写不出一场场精神的变动中那些不可复制的心灵搏战,写不出人心的抗争与颓灭、呐喊与悲凉,那才真正是我们又一层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将这些归因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缺乏应有的内省的力量。

内省亦称“自省”或“自反”,也是自我了解、分析、反思,并建构正确的自我知觉和行为的方法。所以,对着新世纪文学园地的草长莺飞或嘈杂聒噪,我有理由喜欢那些拥有内省意识和沉思力量的作家,或作品,或角色。

(原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点睛”)

目 录

代序 内省的力量 / 001

第一编 生态批评的新视域

论乡土小说“生态”视域的开创及其意义 / 3

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 / 20

“生态文学”与“乡土生态小说”的意涵界定 / 33

“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生态文学“社会发展观批判”主题辨析 / 40

生态批判的“神性”复魅与文化多样性关切 / 57

生命神性的演绎

——论新世纪迟子建、阿来乡土书写的异同 / 68

新世纪小说的“动物书写”及生态内涵 / 84

论“动物书写”的生态批判立场与伦理基点 / 100

生态批评的偏误 / 112

由生态批评谈现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 122

第二编 城市化与乡土挽歌

论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 / 133

伦理的歧境

——新世纪文学“城市化批判”的精神归趋 / 149

呼唤批判与审美的双重力量

——论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 / 160

文化守成与大地复魅

——新世纪乡土小说浪漫叙事的变异 / 171

“起承”与“转合”间的断裂

——新世纪“牧歌派”乡土小说论 / 181

“文化西部”的突围与边地文明最后的挽歌 / 195

“悲慧双解”的佛学启悟与乡土小说的

“藏地风流” / 209

文学返魅·精神拯救·现代理性

——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与宗教文化 / 220

第三编 文本批评的空间

后乌托邦批评的尝试

——读李小江《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 / 237

“现代反思”下的价值困惑与德性坚守

——新世纪张炜小说转型论 / 253

阿来的“及物”与“不及物”

——读《格萨尔王》 / 266

由“虐恋”意涵谈《古炉》叙事的内在断裂 / 278

在“华丽”与“转身”之间

——评刘震云《我叫刘跃进》 / 290

身份：20 世纪的“中国结”

——读田中禾《父亲和她们》 / 300

批判下的转塑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论 / 310

参考文献 / 325

后记 / 331

第一编

1

生态批评的新视域

生态批评,被视为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的“新宠”。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引渡、对中国古代生存智慧与生命观念的发挥、脱离文学文本和生态现实的“不及物”的理论阐发,正成为生态批评的时尚。笔者一直在尝试纠偏,期望找到一条能够更深切有效地介入“中国经验”与文学创作实践的批评路径。“生态批评的新视域”所包含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思路下的尝试。

论乡土小说“生态”视域的开创及其意义

20 世纪末,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文学是否会走向死亡”的沉闷话题时,创作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与书写早已悄然兴起,使得“我们是否还需要纯文学”的质疑不攻自破。生态意识和自然观念的迁变是和现代化发展主题相互对应的,所以和不少研究者不同,我认为中国真正自觉的乡土生态小说作品是新时期以后才正式出现的。在 80 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下,反思文学包括知青文学借助政治批判首先触及了生态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激进思维造成“中国式”生态危机的真相;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整个文化趋向向“无名”转型,时代前行失去了主流方向,生态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但生态破坏的原因已经不同于前,而是各种致因并存,例如发展方式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危机转移、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与欲望的膨胀、技术官僚导致的科技至上等;进入新世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的文化语境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纪元的到来,以生态题材为书写向度的文学显示出空前的活力,如张炜、周涛、王英琦、李存葆、苇岸、周晓枫的“生态散文”,于坚、昌耀、屠岸等的“生态诗歌”,徐刚、李青松、哲夫、陈桂棣、朱鸿召等的“生态报告文学”等,而乡土生态小说无疑是其中的生力军,涌现出一批有着各自“生态”表现风格和伦理立场的作家作品,特别是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郭雪波的“大漠”小说、杜光辉的“可可西

里”小说、迟子建的“东北丛林小说”、阿来的“机村”系列小说、叶广芩的“动物系列”小说、董立勃的“下野地”小说、杨志军的“藏獒”小说、姜戎的“狼文化”小说等“边地小说”，更体现了作家对生态问题的热切关注和对和谐大地的期待视野。

应该明确的是，我们这里把生态题材的乡土小说创作用了“乡土生态小说”这一命名。之所以要强调“乡土生态小说”这样一个概念，而不直接套用“生态小说”这一简单命名，一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一些经济强国相比，并没有大面积进入后现代，二是在于一切生态原本都是乡土的、自然的，即原始生态就是乡土；相对于依傍文化社会学的乡村生存形态写实的小说，乡土生态小说更注重人与“乡土”关系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在这个语义之下，我们主张生态题材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的主体思想从狭隘的“自然”、“环境”关注，进入深层次的价值考量和批判。

一、乡土生态小说勃兴的现实因素和精神动因

乡土生态小说的繁兴有其深刻的现实因素和精神动因。首先，中国工业化的强势推进和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加重，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在满足发展需要的情况下趋于耗竭，成为“稀缺”，更有无秩序无计划的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生物的多样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灾难。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日益发达，原材料供应、生产和消费市场越来越全球化，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一旦被开发，会很快进入市场，成为广大区域甚至全球性的消费产品，大到大面积的森林资源的开发，小到对一些野生小物种的过度消费（例如，商业开发大力宣扬西部高原草甸冬虫夏草的保健功效，以致大批民工集聚西部挖掘有限的冬虫夏草，造成这些草地的水土流失和日益沙化；欧美贵妇酷爱消费藏羚羊羊绒披肩，大批的藏羚羊就遭受了杀戮的厄运）等，还有为了向更远的地方输送电力或者淡水资

源的大型水库的建设必然也会破坏整个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甚至造成一些物种的灭绝、自然的多样化受到破坏。张炜的《刺猬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即揭示了这些对自然的创伤——它们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慢慢修复,有的则是不可逆的、无法弥补的。

其次,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政策造成的压力越来越显露出来,一点点逼进作家的关注视野,挑战着他们的心理极限,成为生态写作与批判的诱发因素。生态危机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口消费和经济发展的问題,人口基数的庞大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因素,意味着人均占有资源将相应减少。排除中国发展方式的弊端、腐败的滋生、科技发展上的落后、舆论导向的失误等因素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庞大的人口数量逼近了自然环境容量的极限。我国的人均可再生资源拥有量多数不到世界人均值的一半: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且土地荒漠化的速度、面积和分布之广令人惊心;水资源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由于工业迅猛发展,污水排放量巨大,水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据水利部的调查,我国700条总长10万公里的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的不到三分之一,被污染的河段和水体占三分之二强。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更是不堪设想,1995年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5个城市即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其总悬浮颗粒指标均进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10名。^[1]雪漠的《狼祸》、唐达天的《沙尘暴》、姜戎的《狼图腾》等告诉我们:人口众多不仅使收入的均数减少,还有就业压力等,这些压力反过来都转向对环境索取的增加,只能是最大限度只顾眼前利益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人口众多所造成的巨大资源需求及其危害将在中国长期存

[1] 参阅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在,贫穷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将挤压着我们。

第三,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的精神危机,目前中国生态启蒙思潮以及生态写作与批判的兴起和这个纷繁嘈杂的时代的精神困境关系密切。(1) 从全球来看,地球作为家园的破败使得人类面临着“失根”的威胁,“危机寻根”也伴随着一种精神寻根、文化寻根从生态叙事中得以发露。(2) 随着中国城市化格局的出现,像西方一样,中国人与自然也处于脱离状态,这种人与自然的脱离一方面使得人的智慧极大进步,另一方面当默默无言的自然在遭受失去敬畏心的人类的控制和摧残时,人们发现自己所追逐的物质盛宴远远没有原本所预期的那么美味可口,心理的落差造成一种精神悲剧感。(3) 对自然的无限度开发甚至掠夺造成的物质“稀缺”也必将拉住中国进步的后腿,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领导的“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1990年所编写的《中国自然资源手册》(程鸿主编,科学出版社,1990)介绍,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在1985年余25.3亿吨;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专题组所编写的《98中国环境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997年我国石油消耗总量为1.85亿吨;根据2001年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滕藤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我国剩余储油为22亿吨,由此推算,我国已探明储油仅仅够用20年左右。既然发展必须利用自然资源,那么资源的耗竭说明发展并不是无止境的,这使得经济发展与落后的矛盾更加突出,对人的精神的冲击也很剧烈。(4) 唯科学论、唯进化论、技术工具理性的负面因素所造成的生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现,例如由于过分倚赖工业化肥,造成大面积土地板结,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再如农田草场林木生长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造成自然免疫系统退化,益虫灭绝,污染严重,这一些都使得整个文化界对一元发展观念、对“科学万能”产生了深切质疑,人们的心灵陷入了矛盾、焦躁、无助和险恶的困境,不得不重新认识“知识的力量”,探索生态灾难的精神因素,

这也是贾平凹的《怀念狼》、京夫的《鹿鸣》、姜戎的《狼图腾》的主题之一。

再者,知识分子的阶层化也和生态书写的繁兴有所关联。新旧世纪之交的文化—文学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声音即便微弱,但现实观照意识特别是生态现实关注有所回潮,乡土小说对生态的关注正说明了乡土作家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图景的深沉期待。历经了改革开放3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成为主流,精英文化被边缘化,但是越来越多的理论家、批评家、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意识到关注生态话题是切入现实世界和精神领地的重要途径,认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真正的根源不在于生态系统,而在于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系统。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有所偏颇,它表明了一种文化反思的勇气和对重建精神家园的担承意识。具有反省精神的人重新发现了自然的伟岸、神奇、纯净、安详和和谐,也重新悟解了科技力量的两面性、人性欲望的可怕、传统伦理的局限和人文精神退化的悲剧,开始渴望重新回到大地母体的怀抱,重新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意的栖居”,作家、批评家站在了“文学的立场”,“以诗性的、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并将其渗透到作品中感染读者,真正的批评家是更高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义者”^[1]。于是,文学把有关人的理想和信念以及复杂的心理矛盾和情感纠葛投入神性自然的描述,从中寻找人类心灵健康的新家园,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刺猬歌》、阿来的《空山》、郭雪波的《银狐》等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个方面的思考。新世纪文学对生态的自觉介入,使得文学创作和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与价值标杆,证明了文学只有更多地拥抱现实,与中国的现实生存和终极关怀相联系,才能有所作为。

最后,当下中国生态书写的勃兴和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也有重

[1] 王先霭:《文学与新时代的自然观》,《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要关系。创作和理论常常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的许多影响缓慢但深刻。一个方面,中国文化所固有的迥异于西方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念在生态危机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它成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和哲学资源,甚至成为危机深重的西方反顾东方时“发现”的一个奇迹;另一个方面,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的生态学理论以及对海外生态题材文学文本、生态文学批评著作的译介,对近年来小说创作和批评都有显著影响。理论引进方面,如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对自然界的义务》(叶平译)、《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法国学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英国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徐波等译)和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日本学者岸根卓郎的《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何鉴译),德国学者狄特富尔特编写的《人与自然》,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等,都是引起关注的著作。翻译过来的书写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题材作品更是不胜枚举,许多外国生态文学家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如美国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森;英国的乔纳森·贝特;俄罗斯的普里什文、列昂诺夫;法国的勒克莱齐奥等,这些对中国生态小说创作和生态批评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的。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如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傅华的《生态伦理学探究》、余正荣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等,都带动或正在推动着乡土生态小说的创作。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生态小说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这其中既有老作家对生态意识的强化,如张洁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推出了《这一生太长了》,标志着她创作的转向;更有凭借这一创作题材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如陈应松、郭雪波、